

Valentin Falin

瓦连京·法林 著

余燕学 译



密室隐情

M i s h i Y i q i n g



军事谊文出版社

密室隐情

——前苏驻德大使法林回忆录

By Valentin Falin

瓦连京·法林

余燕学 译

军事谊文出版社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POLITISCHE ERINNERUNGEN
Copyright bei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 Knaur Nachg., München 19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室隐情/前苏驻德大使法林回忆录/(俄)法林著;
余燕学译.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1. 1
ISBN 7-80150-014-8

I. 密… II. ①法… ②余… III. 法林 - 回忆录
IV. K835.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709 号

书 名:密室隐情—前苏驻德大使法林回忆录
译 者:余燕学
出版发行者: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北京谊文印装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4.59
字 数:360 千字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7-80150-014-8/I·4
定 价:25.00 元
(本社出版的图书,因印装质量问题,可退本社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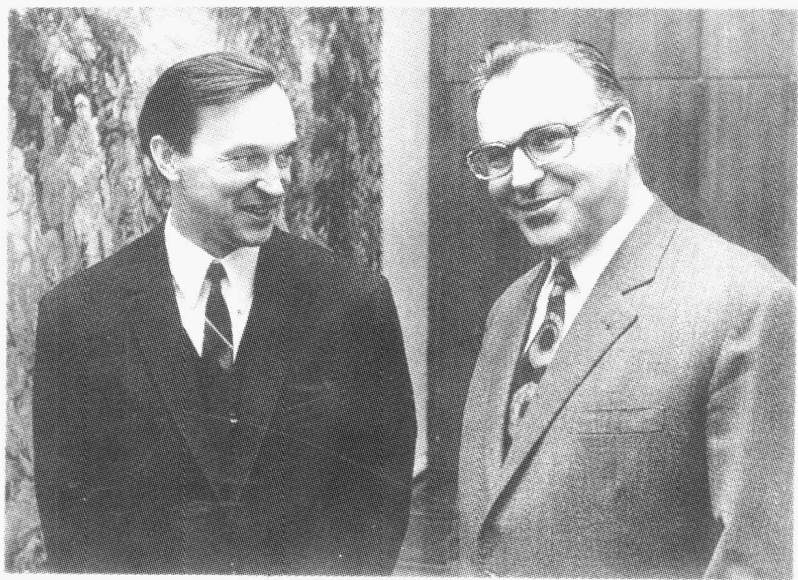
献给北京大学建校
一百周年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
五十周年



1971年5月19日，新任苏联大使法林在绍姆堡宫
拜会西德总理勃兰特。



1973年5月，勃列日涅夫与德国工会联合会领导交谈。



1971年11月18日，莱-普州总理科尔在美茵茨总理办公厅会见新任苏联大使法林。



1973年5月，露特·勃兰特欢迎葛罗米柯。左起第一人：埃贡·巴尔。



1978年8月30日，西德总理施密特会见即将离任的苏联大使法林。



1989年10月14日，社会主义国际组织主席和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勃兰特应苏共中央邀请前往莫斯科。这是法林在机场迎接勃兰特。中间是当时的下萨克森州总理施罗德。



为祝贺勃兰特 75 岁生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于 1989 年 1 月 20 日为这位卸任的总理举行招待会。这是魏茨泽克在哈默施密特别墅欢迎法林。后面是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勃兰特。



1989年10月6日，昂纳克和夫人在柏林机场
欢迎前来参加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活动的苏
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夫人。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瓦连京·法林,1950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随即进入苏联情报部门工作,1959年调到前苏联外交部,曾担任第二、第三欧洲司司长、驻西德大使等职,1988年出任前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1990年7月前苏共28大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法林是前苏联外交情报系统大名鼎鼎的智囊和笔杆子,曾先后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等5代领导人捉刀,写了大量讲话稿、文章、信件,乃至书籍。可以说法林是前苏联政坛一个很具特色的幕后人物。

本书以作者40多年的亲身经历,叙述了前苏联与东欧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前苏联与两德的关系;前苏联领导人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作者与5代前苏联领导人之间的纠葛与恩怨。作者还用了少量篇幅陈述自己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和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作者文笔隽秀,寓意含蓄,我们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力求做到准确、完整。个别段落和句子作了某些删节,我们将这本回忆录奉献给读者旨在为研究前苏联与西方一些大国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前苏联高层的决策过程提供一点参考资料。由于本书系法林自己的回忆录,一些事实和观点相信读者能正确判断。

译者的话

“余燕学”是一个笔名，是我们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76级全班15名同学的笔名。

1980年，我们全班同学在毕业之前合作翻译出版了科学幻想中篇小说《飞船疑案》，纪念同窗友谊。赵登荣教授为我们作了全文校对，王志佑教授为我们选定了笔名“余燕学”——意为“我是北京大学学生”。

1998年5月4日，我们全班同学约会在母校燕园，欢庆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我们就在这一天商定，再度合作翻译一部作品，重温同窗友谊，并献给母校百年华诞和共和国五十周年庆典。

感谢王志佑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我们校对了部分章节，感谢赵登荣教授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尽管全班同学散居于国内外、各省市，但是人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和成书工作。在本书付梓之际，诚挚感谢我的各位同窗好友（姓名排列以本书翻译运作事务承担量多寡为序）：郑向东、陈乐生、石兴岭、汲殿文、蔡玉巧、陈建民、肖宪民、何国强、袁杰、金晓燕、尹宝平、沈小风、顾裕华、张根瑞。

作为当年的班长，我奉同学之命写下这几句话。

王建政

1999年5月4日

代 前 言

“真实的历史不能够写，虚假的历史又不值得写。”十几年来，我用这个答复拒绝了许多朋友和出版商。他们曾经试图劝我拿起笔来，把读者带到历史事件的幕后去，因为我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或参与者。我曾经决意缄默。为了抵御奋笔的欲望，我没有写日记，没有复印国际性文件，甚至没有搜集任何报纸、杂志和书籍资料。我允许自己的惟一例外是保留历年的记事日程本。日程本上经年累月记载了数以千计的日程和姓名，每当人们问起这件事或那件事的发生时间，问起当时有谁在场时，我就可以有案可查了。

我究竟为什么打破了自己的写作禁令？从形式上看，即使以前我也从未守口如瓶。在非公开的讨论中，在与学术界、新闻界的同事们晤谈时，我根本没有遵从那句明哲保身的格言：“舌头越短，牙齿越健。”人们有足够的原因和理由，不去仿效那些令人眩目的楷模人物——我国爱说俏皮话的人把他们戏称为时装中的顶尖品牌。我的谈话伙伴们，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认为我不会滥用他们的信任，不会把他们当作消费品，用完之后随手抛弃。我的作法不合时宜？也许是。会惹麻烦？当然喽。但是，“卸磨杀驴”并非我的为人，也永远不会成为我的信条。

能曲能伸的弹性原则使得道路更加崎岖，无论公事私事概莫能外。尽管我从苏联奥林匹克山脚起步，在40年内攀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但我至今没有熟谙这些残缺的原则。我用来书写出分析报告、外交照会、备忘录、条约文本、声明草案、公开信、电报、讲话稿、记者招待会备用口径和文章的纸张，我以赫鲁晓夫、戈尔巴

乔夫的名义书写的书籍，以正式笔名亚力山德罗夫、虚假化名卡帕罗夫撰写的文稿，也许已经耗费了足足一公顷树林的木材。我所写的文字，旨在一心为国效力，既不向任何人阿谀，也不向历任总书记和总理奉承。

因此有些人认为，考虑到我的职务，这样做未免胆子太大、过于随心所欲。我因此而不得不接受教训，以至于有时候自尊心受到擦伤或者挫伤。

有一次，我与另一名外交官一道被提名为获得某种高级勋章的候选人。然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和“高层”的另一位老人家认为：“他刚满40岁，年纪轻轻就授予这么高的勋章，这不利于教育。”

1966年，人们传说我是驻英国大使的候选人，但是这个提名后来被撤销了：“他有点固执。不过，也可以在中央派更大的用场嘛。”于是，人们猜测我是否适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表格填了一张又一张，档案翻了个底朝天。他们是要查实，我的亲戚中是否隐藏着烧炭党人，我本人是不是从“战争期间失踪者”的圈子里冒出来的。他们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贴切的理由：“大使需要独立工作，他根本没有实际经验，难以担任此类职务。”

这些鸟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对仕途、勋章和荣誉称号的无动于衷并不是装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祈求，在党和国家机关里谋得这个或那个职位。通常是他们向我提出要求，或征求我的意见，然后我在他们允诺的或我自己要求的各种条件下接受某项工作。关键的是，我的要求总是基于自己的意愿。上司们找我谈话时早已知道，他们是不会听到我唱什么颂歌的，有时反而会听到相当逆耳的声音。于是他们会皱起眉头，久而久之也就明白了，在我的年市上不会找到谄媚的货色。

安东·契诃夫本应说：“世界不相信眼泪。”对当今玩世不恭者来说，这些眼泪原本不过是“昨日积雪”。我的文字别无他意，只是

想实事求是地说明，我是如何在各种困境中仍然保持自己信条的。无非是在撞上隔音墙之前抢白一句，说明我如今是怎样处于微观和宏观的贬值之中。

昔日的苏联已经衰落。为了可怜兮兮的银钿施舍或者零利率，居然出卖尊严和名誉。诸如尊重民族遗产、感谢祖先恩泽之类的话，居然会引发哄堂大笑。人们的嘴脸重新回到了哈哈镜王国。知识越贫乏的人，越能夸夸其谈；权力越无节制的人，贪欲就越是无边无际。

当我们看见有人在祖国的废墟上跳舞时，心中情不自禁地要问，我们现在究竟有多少潜在的英雄甚或潜在的预言家，如今隐藏在丛林中，等待着他们时代的到来？毫无选择地利用一切机会沽名钓誉者，还是大有人在。

一幅可耻的画面。作家契诃夫断言：“野蛮、卑鄙和无知不尊重故人，只奉承今人。”

今天的我们，真的还是俄罗斯立国前夜的那些异教徒吗？如今的我们，也在把活生生的、无法估价的财富背到焚烧异教徒的柴堆上去。昔日是为了逝者的名誉，今日是为了报复；昔日是为了让一个人的灵魂安息，今日是为了让一个制度寿终正寝。也许这就是全部的差别？如今，一切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相对性和临时性。就连生命也是用高利息租来的，况且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命，甚至包括一个民族的生命，乃至全人类的生命。有一点您一定会同意——任一时期、任一政府的宠臣通常都是打家劫舍者和重利盘剥者。他们热衷的是，把所有东西都分门别类地划入有现利可图的范畴，把各种复杂的问题不厌其烦地、彻底地简单化，直至这个为大众所有的整体世界，最终简化为趋从于一己私利的封闭社会。固执己见的利己主义者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他的今天源于昨天，他并没有权利危及陌生的明天。对这种人来说，一己私利重于一切，甚至厌恶“现时代的相邻莫如相交更能创造文

明”这样的想法。一切都日益变得更具相对性和临时性——当我说这句话时开始有点结巴了，因为这并不是必然规律。由于我们缺乏责任心，由于我们极度的喜怒无常，使这个地球少了几分生活的乐趣。在20世纪中，各国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使我们的星球适应形形色色地缘政治的要求，适应热战和冷战，适应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如果不歪曲事实，没有人敢说自己在这场射击比赛中只是旁观者。

有人说，时间可以医治一切创伤。拉开时间间隔之后，比较容易找到评价往事的恰当尺度。古希腊人曾经说过，即使上帝也无法挽回已经发生的往事。他们以此方式告诫世人，应当做日后不会后悔的事。

历史的发展不会按照学院派政治学家主观拟定的程序和图解进行。我们这个世纪显示了极其鲜明的特点。不道德的行为如此长期而又冷酷地挤压道德，以至于迎接“金色20世纪”到来时的欢呼声已经荡然无存。由于一次次失望和忧虑而垂头丧气的我们，正拖着疲惫的脚步一步步走向自己被审判的那一天，走向第三个千年轮回。

让·德·拉布吕耶尔(法国作家，1688年撰写《本世纪特点与习俗》。——原注)也许是对我们所有同时代者写下了这句话：“大多数人正用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把最糟糕的岁月塑造得更加悲惨。”我冒昧地补充一句：不仅把自己生平的晚年描述得更加黑暗，而且把那些辛勤劳动者的命运描述得更加黑暗，而这些劳动者正在奋力挖除我们面前由问题堆积而成的一座座大山。

之所以回忆，并非因为对往事已经淡忘，而是为了使往事更加清晰。我想避免自己由于对今日的苦恼和对未来的担忧而走向机会主义的岔道。当然，我们理应防止自己以及读者被其他极端主义者引向拥有坚定教义的古埃及。请设想一下有关图特摩斯一世麾下武士们的小说，小说中写到了“倒流的江水”(系指幼发拉底

河),那江水向下流去,而正常的江水应当像尼罗河那样“向上”流去。

认识的基础是理解,理解的基础是体验。只有认知才能却除偏见的魔力。然而,当人们侵犯你的名誉时,你却极少有可能自卫,因为法律禁止你与损坏名誉者角斗。夫复有何法?惟有说真话。真理可以被压抑,但是,只要真理依旧是纯粹的真理,是完全的真理而别无杂质,那么真理就不可以被侮辱。我坚信,一个人只要忠于真理,他就不会失去尊严。

否认事实并不能改变状况,但会使结局复杂化。在这个意义上,今日的大多数问题都已成为真正的代价,为的是补偿昨日尚未做完的工作和未能及时认清的要求,补偿昔日的无能或者反感——二者完全取决于他的良心。这里蕴藏着未来的教训。

回忆是一种漫游,漫游在一块属于大家而不是一家的土地上。这块土地不属于你自己,因此你没有权利单独拥有它。在政界,几乎不存在属于个人的回忆。我的回忆录,回忆的是我的国家,回忆的是我的人民和我这一代人的悲剧,回忆的是正在黑暗中沉没的俄罗斯千年历史。

如果世人严肃地对待回忆录,不去用最新视点追溯历史,也不仅仅突出历史光谱中那明亮闪光的光束,那么回忆录本来就是一种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写作方式。世人可以重新经历和感受一切,将浮在表面的新事,与早已杂草丛生的旧事拼接在一起。曾经折磨过灵魂、带来过失望、使人们本想把它当作恶梦一样忘掉的一切,又不得不任其复活。

回忆是为了思索还是咒骂?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究竟这是光明的尽头还是曙光初照?如果我们有朝一日恢复理智,就会看清:从仇恨中只会产生仇恨,从罪恶中只会产生罪恶吗?耐心是一切智慧的基础,忍耐是走向和睦的惟一途径。只需暗示一点忍耐和耐心,就会带来希望。希望何在?